

# 苏联援助与新中国军事工程教育的开端

## ——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为例

杨爱华<sup>1,2</sup>, 胡新和<sup>1</sup>

(1.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北京 100089;  
2. 国防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长沙 410074)

**摘要:** 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建为案例, 试图分析在新中国军事工程教育的起步阶段苏联援助的历史作用。文章从建院动议、校址勘定、组织编制以及教学科研等方面, 考察了苏联援助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历史过程, 并就苏联援助对中国军事工程教育的影响与军事工程学院学习苏联模式的经验教训进行了反思。

**关键词:** 苏联援助; 中国; 军事工程教育

**中图分类号:** E29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969(2010)01-0082-10

经过新中国军事教育领域从业人员的不懈努力, 目前我国的军事工程教育已蔚为大观, 堪称完整的军事工程教育体系, 在国家的国防事业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军事装备的保障作用。“物有本末, 事有终始”, 今天的军事工程教育成就从何而来? 鉴往知来, 对此一问题的回答对于我国未来军事工程教育的发展会有启发作用。

军事工程教育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培养军事工程师。所谓军事工程师, 是指受过高等军事技术(专门)教育, 在部队(舰艇)、兵团、军团和其他军事部门机关中担任工程师职务的军人, 其主要职责是完成与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的使用、保养、维修以及人员的技术训练等有关的任务<sup>[1]</sup>。冷兵器时期由于武器装备的操作和维护相对简单, 武器装备的维护是由使用者——士兵来完成的, 因而, 没有对于职业军事工程师的需要。热兵器时期武器装备的技术含量大大提升, 对武器装备的使用和维护更多地依赖于人的专门技能, 这就产生了对专门人才的需要, 军事工程师应运而生。

“17世纪末, 法军中军事工程师合并组建了自己的军团, 这使得法国的战争组织能力上升到新的高度。”<sup>[2]</sup>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更充分证明了武器装备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世界各国在战后都加紧了新式武器装备的研发。随之, 也对这些新式武器装备的维护、使用培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中国成立伊始,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仍处于以小米加步枪为主的落后状态, 与此同时, 新中国面临着台海战事和朝鲜战争的爆发等危及共和国巩固的战争威胁, 人民解放军不仅迫切需要大批现代化的先进武器装备, 而且也需要大批专门的军事工程技术人才使用操作和维护保养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其中大部分武器装备是从苏联订购而来的)。为此, 中央军委决定开展军事工程教育以培养急需的专门军事工程技术干部。在当时中苏同盟关系的政治背景下, 苏联对中国经济和军事领域都提供了大规模援助, 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建为肇始, 新中国军事工程教育在苏联的援助下开始发展起来。

收稿日期: 2010-01-11; 修回日期: 2010-01-23

作者简介: 杨爱华(1976-), 女, 湖南桃江人,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军事技术史。E-mail: yah76@126.com

胡新和(1955-), 男, 江苏南京人, 教授, 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

关于苏联对中国军事教育援助的问题，依据笔者所查阅到的文献，目前尚未见到国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直接研究。国内学者仅有国防科技大学的赵阳辉从事过此问题的研究，其主要成果体现在其硕士论文“苏联援助创办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历史研究(1952—1956)”<sup>[3]</sup>。该论文从制度建设、资源整合和政治工作三方面探讨了苏联在1952年到1956年期间对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实施援助的历史过程，但未涉及到苏联援助对新中国军事工程教育的发展及影响问题的探讨。本文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创办的缘起，苏联对哈军工的校址论证、组织编制确立、教学科研指导的具体援助等方面进行分析，探讨了苏联援助对整个中国军事工程教育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反思了军事工程学院学习苏联模式的经验教训，试图能够为中国现代军事工程教育的发展和开放办学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 1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缘起：朝鲜战场的需求与斯大林的提议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志愿军义无反顾地投入保家卫国的战争之中。朝鲜战争期间，虽然志愿军凭着高昂的士气，以落后的装备与配有先进武器装备的以美军为首的侵略军集团进行了殊死搏斗，取得了胜利，将侵略者赶回到了三八线以南，但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朝鲜战争期间的第三次战役和第五次战役，敌军能够使我军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军对军事工程设施的及时修复能力，相形之下，志愿军对军事通信设施的低下修复能力使志愿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充分暴露出了装备和技术的落后对作战所造成的消极影响。面对如此严峻的战争态势，彭德怀和陈赓(后被中央军委任命为军事工程学院首任院长)深深意识到武器装备和军事技术已经成为战争制胜因素，因而必须迅速加强武器装备的支援和建设。陈赓在1952年6月汇报朝鲜战争情况的时候，总结出“要彻底打败现代化武器装备的

敌人，没有先进的技术装备不行，技术兵器确实是决定战争胜败的重要因素。”<sup>[3] 692</sup>然而，新中国的“军工企业只能从事旧杂式武器装备的修配和小批量生产，专业门类不齐全，空白很多，不具备国防建设必需的飞机、舰艇、坦克、大口径火炮、军事电子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研制、生产条件和能力。”<sup>[4]</sup>为了迅速提高部队的武器装备水平和适应朝鲜战争的急切需求，新中国成立之际就开始从苏联订购飞机、舰艇等大量武器装备，而武器装备的操作、使用和维护需要大批具备一定军事素养的工程技术人才来完成，但是当时解放军的官兵文化素质普遍较低，“最先进的人民解放军90%是由步兵所组成，……军事教育训练水平很低，经过训练的指挥干部极度缺乏，一些指挥员由既没有接受过军事教育也没有接受过普通教育的人担任，他们的经验根本就不能进行现代战争。”<sup>[5] 25</sup>面对从苏联订购来的大批装备以及缴获的美军装备，仅靠聘请的苏联顾问根本不能适应朝鲜战场的繁重的武器装备维护的需求。当时朝鲜战争尚没有停战的态势，中央军委以持久战为战略方针，因此，人民解放军迫切需要经过正规军事教育训练的专业军事工程师掌握武器装备的使用、操作和维修保养，适应朝鲜战场提出的紧迫需求。

与此同时，面对当时的战争态势，斯大林在提供武器装备的同时，提议中国人民解放军需要组建一所高等军事工程技术院校，以培养专业的军事工程师。关于斯大林的这一提议，笔者在档案馆里没有找到相关的文献记录。《陈赓传》里是如此记载的：毛泽东对陈赓说，斯大林在援助技术装备时就建议中国人民解放军组建一所高等军事技术院校，并且同意派苏联专家前来协助办学<sup>[3] 691-694</sup>。军事工程学院筹备委员会成员之一李懋之回忆到：“1952年6月23日，毛泽东在会见陈赓时说：‘朝鲜战争爆发后，斯大林在援助我们部分技术装备的同时，就提出赶快办一所培养技术军官的大学……我们的武器装备也要在战争中不断改善，需要技

术军官是紧迫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也需要大批技术军官, 苏联要派各专业的专家来协助我们办学院”<sup>[6]</sup>。此外, 国防科技大学的赵阳辉在采访军事工程学院首任副院长刘居英时, 刘居英在采访中也证实: 陈赓曾经对他说过, 最早是由斯大林向毛泽东建议创办军事工程学院的<sup>[7]</sup>。在斯大林的直接提议下, 依据朝鲜战争对军事工程师的紧迫需求, 中央军委审时度势, 决定创办一所高等军事工程技术学府, 出于保密的需要, 将“技术”二字去掉, 定名为军事工程学院。1952年3月18日, 代总参谋长粟裕向军委呈送了“关于成立军事工程学院的报告”, 3月26日毛泽东批示“同意”。1952年6月时任朝鲜战场志愿军代司令员的陈赓奉命回国着手筹办军事工程学院。

史料表明, 正是朝鲜战争的现实需要及斯大林的建议, 促成了在新中国开展军事工程教育的最初动议, 因此而诞生了新中国第一所军事工程学院——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 2 苏联专家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筹建、勘定校址过程中的作用

中央军委确定创办军事工程学院之后, 根据办学的实际条件以及斯大林的口头承诺, 即向苏联提出聘请专家协助筹建学院。1952年6月周恩来向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发出了“关于军事工程学院聘请苏联顾问”的电函, 7月8日苏联即派来了以奥列霍夫(В. И. Орехов)中将为为首的专家组“协助设计筹办军事工程学院, 专家组有一空军中将、一炮兵少将、一内燃机权威专家及一海军少校组成, 随行一苏籍译员。”<sup>[8]</sup>苏联专家抵达后, 就如何筹建军事工程学院进行了一次谈话, 提出了组建综合性军事工程学院的构想。苏联的军事工程师主要由各军兵种所属军事工程学院和学校培养, 当时的苏联已经有克雷洛夫海军工程学院、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捷尔任斯基炮兵工程学院、基辅高级坦克工程学校等十几所各军兵种不同等级的军事工程院校。但

是, 苏联专家组依据当时中国师资力量匮乏的实际情况, 认为创建各军兵种独立的军事工程学院是不现实的, 建议“在工程技术方面能保证现有特种兵平时与战时的需要, 在各系基础上将来能发展为各兵种专门学院”原则的基础上, 首先创办一所包含各主要军兵种的综合性军事工程学院。<sup>[8]</sup>等到这所综合性学院发展到一定程度, 在师资力量和教学设备有保证的条件下再分别建立各军兵种的军事工程学院。确立先综合创建再分建的方针之后, 苏联专家组在陈赓的陪同下, 进行了校址的考察论证工作。

在确立要创办军事工程学院之后, 中央军委考虑到哈尔滨远离国防前线, 有东北雄厚的工业基础为支撑, 同时也有哈尔滨工业大学和哈尔滨医科大学等高校教育资源的支持, 特别是有急需的房舍资源可以调配和利用, 初步拟将校址设在哈尔滨。这一初步设想在1952年6月23日军委正式颁布的《关于调整全国军事学校的命令》中已经反映出来: “三、军事工程学院(拟设哈尔滨): 为训练全国海、陆、空及各兵种高级技术人员。”<sup>[9]</sup>在苏联专家组到达北京之后, 陈赓向周恩来汇报说, 尽管军事工程学院拟设在哈尔滨, 不过还是应该尊重苏联专家的意见, 让他们去各地考察论证之后, 再确定最终校址。于是, 从1952年8月5日起, 依据“邻近现代国防工业及工科大学, 距离国防前线较远, 有较集中及适合教学要求的房舍可资利用的基本原则”<sup>[8]</sup>, 陈赓陪同苏联专家组乘飞机考察了南京、上海、大连、长春、沈阳、哈尔滨等地, 一方面全面了解解放军的技术力量, 另一方面勘定最佳校址。专家组首先飞抵南京和上海, 这两所城市的经济、文化、交通条件以及南京军事学院成功的办学经验、上海几所著名高校的教学背景让奥列霍夫非常满意。然而, 作为国民党原首府驻地的南京敌对势力盘根错节, 社会关系鱼龙混杂, 大上海十里洋场的繁华, 以及两座城市均处于台湾国民党空军的飞行半径之

内, 这些将为高度机密的军事工程学院的保密工作带来诸多不利。由此, 陈赓和奥列霍夫否定了选址南京和上海的合理性。接着陈赓带领专家组来到大连, 历史知识丰富的奥列霍夫熟知这所一度为苏军驻地的“旅大”海滨城市, 他们在大连重点考察了 1949 年底成立的大连海军学校, 大连浓厚的俄罗斯氛围以及海军学校火热的办学热情虽然使奥列霍夫深感满意, 但此时的大连与炮火连天的朝鲜半岛毗邻, 这在陈赓和奥列霍夫心中成为一道无法跨越的障碍, 于是, 专家组继续往北前往长春、沈阳和哈尔滨。专家组到达哈尔滨后, 几乎无可置疑地勘定这里为军事工程学院的最佳选址。因为, 从地理位置来说, 哈尔滨距离苏联最近, “像坐在一把沙发里, 四周是苏联广阔的远东地区”<sup>[10]</sup>, 这对于军事工程学院的安全和保密工作无疑是最理想的。从政治和社会资源来说, 哈尔滨是东北的大都市, 具有相对雄厚的工业基础, 同时又有哈尔滨工业大学可调配的师资力量和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四万多平方米校舍可资利用, 这为筹办军事工程学院提供了良好的资源条件。从苏联专家自身的角度来说, 哈尔滨具有典型的俄罗斯风情和文化氛围, 自 1891 年中东铁路修建以来, 在哈尔滨从事商业活动和长期定居的俄罗斯人逐渐增多, 他们带来了哈尔滨市内随处可见的俄式教堂等建筑和俄式美食, 这无疑更加让苏联专家倾心于勘定哈尔滨为军事工程学院的最终校址所在地。

从苏联专家协助勘定军事工程学院校址的历程来看, 定址哈尔滨虽然不是苏联专家直接提出的方案, 但是经过苏联专家的考察和勘定, 他们进一步论证了哈尔滨为军事工程学院校址所在地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为军委最后的确定选址哈尔滨提供了论证依据。

### 3 参照苏联行政管理模式, 确立“横宽直短”的组织编制

校址确立之后, 苏联专家着手帮助拟订学院

的组织编制。苏联各军事院校组织编制的基本特点是“横宽直短”, 横宽是指在院长下面直接设四到六个副院长, 每个副院长各主管一个方面的工作, 政治、教学、科研、队列、军需等各项工作几乎都是各由一名副院长直接分管。另外设置较多院直属教授会(即教研室, 笔者注), 这些教授会主要承担公共的基础课程, 直属教授会也由各副院长直接管理。直短是指领导机构的层次很少, 由于各副院长直接主管各项工作, 系几乎只承担系属教授会的教学工作。横宽直短的效果是分工细致和高度统一的集中领导, 这是当时苏联比较典型和传统的领导管理体制模式。军事工程学院 1953 年度的组织编制就是“根据与苏联专家商讨的意见和学院的教学任务, 基本上参照苏联军事学院的最新编制, 本着横宽直短、尽量减少层次的组织原则”<sup>[11]</sup>制定的。1953 年度的组织编制是学院设立了院长、政治委员、教育长和副教育长; 院机关设立了科学教育部、政治部、物质保障部、干部部、工程技术勤务部、行政队列部, 各部首长直接主管相应的各项工作。院长和政治委员由陈赓担任, 教育长主管科学教育部和政治部, 副教育长主管队列部和物质保障部。此外, 按照苏联专家的建议, 依据目前已有主要兵种及战时需要的原则, 设立了空军工程系、海军工程系、装甲兵工程系、炮兵工程系、工兵工程系, 在各系下面成立了 22 个专科(即专业, 笔者注), 基本涵盖了各军兵种的专业技术领域。

军事工程学院各系与专业的设置相应参照苏联各主要军兵种军事工程学院的专业设置, 学院的行政机构和组织编制也是参照苏军院校的编制标准制定的, 但同时也保留了我军自己特有的传统, 为此和苏联专家存在过一些分歧。比如, 学院在建院初期虽然只设有陈赓一位院首长, 但他是身兼院长和政治委员职务的, 到 1957 年中央军委正式任命谢有法担任学院的政治委员。关于这一点, 苏联专家持有不同看法, 认为不需要设立两位院首长, 这其实涉及整个 20 世纪 50 年代学

习苏联过程中存在的“一长制”和“两长制”之争的问题。苏军在卫国战争结束之后就一直稳固地实行一长制,即每个单位只有一个首长,集中所有权力负责全部工作,政治委员是副职的角色。我军的传统是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军政首长平行分工负责制。虽然在学习苏联过程中,彭德怀等曾经有过推行苏军一长制的想法,但是依据“政治工作是我军生命线”的传统及部队的实际情况,最终仍然确立了两长制的原则,因此军事工程学院的组织编制在“院首长”这一层次实行的是两长制。其次,关于副院长和教育长的问题。军事工程学院1953年没有设立副院长,1954年调整组织编制后增设了刘居英为副院长,取消了教育长和副教育长,原来归教育长和副教育长主管的部门直接隶属于学院,组织层次更为精简了,这一精简模式也是参照苏军院校模式逐步调整的。各部门设立各部门的首长,如科学教育部的首长徐立行,其称谓是科学教育长。但是,在苏军院校是直接设立副院长,由各个副院长主管各部门的工作,比如主管科学教育工作的首长直接就是科学教育副院长,而不是在各部门设立各部门的首长,称之为科学教育长。苏联专家认为这样的组织编制多了一层繁琐的不必要的指挥机构。首席顾问奥列霍夫在一份总结报告中以科学教育部为例提出意见:“到目前为止,还设有不必要的中间指挥机构……科学教育部就可作为这种不必要的中间指挥机构的例子,因为完成教务、科学研究和编辑出版三方面职责的是三个处(教务处、科学研究处和编辑出版处),它们应当不隔任何中间机关(中间机关指科学教育部,笔者注)而直属于一个首长——科学教育副院长。”<sup>[12]</sup> 这个问题,即是副院长还是教育长之争的问题,对此军事工程学院一直没有和苏联专家取得一致意见。首席顾问奥列霍夫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在他递交给科学教育部的报告中,他对科学教育长徐立行总是称呼为“科学教育副院长徐立行同志”,教育顾问叶果洛夫(И. И. Егоров)也是称呼为科学教育副院长,对政治

部主任的称呼则是政治副院长(按照我军的称呼应该是政治部主任,笔者注)。关于这两方面的分歧,军事工程学院和苏联专家一直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然而,整体而言,军事工程学院组织编制的模式是沿袭苏联的,由于苏联专家的建议以及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着一些实际问题,军事工程学院1953年度的组织编制先后有过几次调整,但其调整仍然是本着精简机关、简化层次的苏联横宽直短的模式进行的。

#### 4 苏联专家对教学与科研工作的组织指导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建院之初,中央为学院制定了办学方针,即尽快培养适应战争需求,精通技术、能熟练使用武器装备操作和维护的各军兵种高级军事工程师及国防科学技术研究人员,促使新的技术兵器 and 装备的发展与创造,依据此目标方针,苏联专家组织和指导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教学与科研工作。

教学工作毫无疑问是教育的中心任务,“为了培养和重新训练领导干部,中国铺开了军事院校网络,军事院校的教学过程是在吸收苏联军事院校教育经验的基础上开展的。”<sup>[5]27</sup> 苏联对军事工程学院教学工作的援助主要是通过苏联专家帮助制定教学制度和教学计划、授课和培训助教以及编写教材资料等方式予以援助。为了尽快建立军事工程学院的教学制度和秩序,使教学工作有章可循,苏联专家参照苏联有关军事工程学院的教学计划和各项教学制度,集中各军兵种工程技术院校的经验,“集体创作”了《教学过程组织基本条例》。《教学过程组织基本条例》主要从怎样进行各种教学活动以及执行教学的各个部门怎样组织和如何进行工作两方面做出了相关规定,条例一共由9章144条组成。这9章包括了教学人员对学员作业的领导、学员的独立作业、教学过程的检查、考试与测验、对教授会与教学人员的指示、关于组织与保证教学过程所需的文件、对上

课时秩序的指示、全院在职人员的学习、保证与组织教学过程的各部门及其负责人员的职权与职责<sup>[13]</sup>。《教学过程组织基本条例》高度浓缩了苏联各军兵种军事工程学院的办学经验，是苏联军事工程学院教学组织制度和教学业务工作展开的缩影，是军事工程学院组织教学工作的主要依据。

军事工程学院 1953 年制定的四年制教学计划和 1955 年制定的五年制教学计划基本是由苏联专家组制定的：“1957 年以前，学院的教学计划基本是参照苏联同类专业的教学计划制定的；之后，虽经多次调整和修订，但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环节安排等许多方面仍然受到苏联计划的影响。”<sup>[14]</sup>当时，为了适应战争对军事工程师需求紧急的形势，苏联专家 1953 年制定的教学计划由苏联有关军事工程学院五年和五年零八个月的学制压缩成四年制。然而，这种压缩带来的问题是课程的教学内容多，学时高，学员负担过重，课程与课程之间的衔接也不紧密。首席顾问奥列霍夫意识到由于学制的缩短带来了诸多问题，尤其是学员的基础不牢影响培养质量，对此他于 1955 年 1 月 3 日向副院长刘居英建议学员学制改为五年，并提出了相应的方案。根据奥列霍夫的建议，学院经过讨论和研究后向中央军委提交了报告。军委于同年 2 月 2 日正式批准：从 1955 年 9 月 1 日入学的学员开始将学制延长为五年。学制延长为五年后，在教育顾问叶果洛夫的主持下相应修订了教学计划，即 1955 年制定的五年制教学计划。

在《教学过程组织基本条例》的基础上和苏联顾问的具体指导下，军事工程学院从开始就实行正规化教学，建立了一套严谨的教学制度。比如，对于教员而言，凡新开课和开新课的教员都必须通过试讲；各部门首长必须定期或不定期对教员的讲课进行巡视和检查；学员如果有多于两门课不及格的令其退学等等。生产实习是苏联高等教育和苏军院校非常重视的一个环节，苏联的高等教育非常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学术和实践两者是相辅并行的……高等学校把理论和实

习联成为统一的学习过程，而计算到使生产实习的每一个阶段，必须配合理论课程相应部分的学习进度。所以，生产实习便是学习过程里有机的一部分。”<sup>[15]</sup>苏联专家认为实践性教学对于军事工程师的培养更加重要，《教学过程组织基本条例》明确规定，生产实习是军事工程教育非常重要、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学员实习必须研究军用器材的特种生产与生产的组织工艺，研究试验与检查军用产品质量的方法与技术，研究部队现有技术兵器的维护、战斗使用和组织修理的各种条件。在军事工程学院第一期四年制、第二期五年制和第三期五年半制的教学计划中，生产实习的环节分别占 7.7%、10.9%和 17.9%的比例。

教学业务工作是通过苏联专家给助教讲解，助教试讲，然后再由助教给学员授课的形式展开的。通过这种教学形式，苏联专家不仅传授了知识，开展了教学业务工作，而且帮助了军事工程学院在较短的时间里培养一批教员。科学教育长徐立行在 1956 年 5 月学院的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上总结到：三年来，学院在苏联顾问的指导和帮助下开出了 180 门国内过去没有开过的军事技术科学专业课程，培养了 248 名助教充任了讲课教员<sup>[16]</sup>。国防部检查组在 1956 年 2 月提交的对军事工程学院的检查报告中充分肯定了苏联顾问培养助教的形式和成果：“现有的助教都是大学毕业的，在苏联顾问的耐心指导下，目前已有 160 人实际上担任了讲师的工作，大部分讲课效果良好，这样学院的教员问题已经初步获得解决。”<sup>[17]</sup>

作为一所高等军事工程技术学府，军事工程学院的目标和任务之一是使学院成为全军军事科学研究的基地和军事工程技术思想的中心。奥列霍夫在 1954 年 1 月 4 日给科学教育长徐立行的信中就指出军事工程学院的基本任务之一是组织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促使新的技术兵器和装备的发展与创造。1954 年 2 月他又特别针对科学研究工作专门进行了一次谈话，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苏军院校中科学研究的基本情况，对军事工程学院如

何组织开展科学研究工作提出了相关建议, 尤其建议在学员中成立军事科学技术协会, 培养学员的科研能力<sup>[18]</sup>。根据奥列霍夫的建议, 自 1955 年开始学院相继颁布了《军事工程学院科学研究工作条例》、《科学研究奖励暂行办法》等系列组织和鼓励科学研究的条例规章。学院还参照苏军院校举办科学研究会议的经验, 于 1956 年和 1957 年召开了两届科学技术研究会议, 教员在会议上报告和交流科学研究成果, 学院邀请华罗庚等著名教授来院讲学。通过系列措施和活动, 学院的科学研究工作很快根据国防和科技发展需要全面铺开, 同时还吸收优秀学员参加科研小组活动。1956 年 4 月, 在学员中成立了军事科学技术协会, 吸收成绩好的学员进行科学研究工作, 培养他们在科学研究和实验方面的独立工作能力。自此, 军事工程学院形成了浓厚的科研氛围, 逐步发展成为全军科学技术思想的中心和国防科学研究的基地。军事工程学院科学研究工作成果的取得和浓厚科研氛围传统的形成是和苏联专家的帮助分不开的: “我们学院科学研究工作所以取得今天的初步成绩, 和其他各方面工作一样, 是和苏联顾问同志的帮助分不开的。”<sup>[19]</sup>

在苏联顾问和专家的大力援助下, 军事工程学院的各项工作很快走上正轨, 从 1953 年到 1960 年共招生八期学员 14000 多名, 如期顺利地培养大批军事工程师和军事科学技术研究人员。随着 1960 年 7 月赫鲁晓夫单方面宣布撤退全部在华苏联专家, 军事工程学院的苏联专家也先后撤走, 至此, 苏联对新中国军事工程教育的援助随之终止。

## 5 关于苏联援建中国军事工程教育的若干反思

作为新中国军事工程教育的发端,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建立及苏联援助对于我国军事工程教育以后的发展具有重要历史意义。阐明苏联援助的历史作用, 总结其中的教训, 对于未来中国

的军事工程教育不无借鉴价值。

### 5.1 关于苏联援助的历史作用

可以说, 苏联的援助奠定了新中国军事工程教育的基础。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是一所包含了各军兵种主要专业的高等综合性军事技术院校, 在学院工作的苏联专家数量之多、时间之长和专业分布之广是其他军事院校难以相比的, 因而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被称为苏联援助中国军事院校教育的典范。根据军事工程学院的档案记载, 1954 年 11 月学院各系已有苏联专家 56 人, 1955 年共有 62 人, 到 1957 年 12 月在院工作专家累计为 137 人, 1958 年和 1959 年各拟增聘 18 名。但 1958 年和 1959 年最后派来的实际名单笔者没有查到, 据 1958 年专家工作总结报告, 1958 年在院工作专家 40 人, 其中 36 名在 1958 年底回国, 延聘 4 名; 1960 年 4 月发布的 1959 年专家工作总结报告指出, 1959 年在院专家 14 人。由此可知, 1959 年实际来院的专家为 10 人。据此推算的话, 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工作过的苏联专家大概为 165 名左右<sup>[20]</sup>。他们的专业覆盖了空军工程、海军工程、坦克工程、炮兵工程、工兵工程和导弹工程等主要军兵种工程技术教育的各个专业领域。苏联专家从学院的筹建, 到教学科研等各项工作的展开都提供了全面的积极援助, “如果没有苏联政府和苏联顾问的帮助, 军事工程学院不可能建设得那么快”。<sup>[21]</sup>苏联专家在军事工程学院工作认真负责, 勤勤恳恳, 他们为军事工程学院的建设做出了积极有效的贡献, 尤其是首席顾问奥列霍夫为了能看到 1953 年入学的第一批学员毕业, 主动延长工作期限, 最后于 1957 年 3 月病逝于哈尔滨。苏联专家对新中国军事工程教育的援助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突然终止, 其援助对象也仅限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但是, 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军兵种军事工程教育都是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各个专业的基础上组建和发展的。作为综合性军事工程学院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当时是为了解决

战争对军事工程师的紧急需求与我军师资力量和装备极其匮乏的实际矛盾而成立的。在学院筹备之时，苏联顾问就指出学院各系和专业的设置应尽量包括未来各主要军兵种教学组织的雏形，以备在条件许可之时成立各军兵种单独的军事工程学院。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筹备时，苏联顾问提出的各系与专业设置方案也是按照这一基本原则考虑的。1959年11月，陈赓向中央军委提出：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的迅速发展对军事工程技术干部的需求量与日俱增，军事工程学院的培养任务日趋繁重和复杂，全军仅办一所综合性军事工程学院无法满足其需求；同时，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各系与专业已经具备一定师资规模和教学设备条件，因此，建议在现有军事工程学院的基础上分建各军兵种独立的军事工程学院。1959年12月，中央军委批准了陈赓的建议，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开始分建为各军兵种独立的军事工程学院：1960年6月，学院的炮兵工程系被组建为炮兵工程学院；1961年5月和6月，装甲兵工程系和工兵工程系分别被组建为装甲兵工程学院和工程兵工程学院；1960年6月，原子化学防护系（该系成立于1960年6月）被组建为防化学兵工程学院；1962年1月空军工程系的两个专业被组建为空军工程学院；1962年2月，海军工程系的五个专业被移交和组建为海军工程学院。自此，新中国军事工程教育形成了包含培养各军兵种军事工程技术干部的完善的教育培训体系，这一教育体系的发源地和孵化器是苏联全面援助下建立起来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因此，从这一角度而言，苏联援助奠定了新中国军事工程教育的基础。

## 5.2 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建设过程中的若干教训

苏联援助虽然对我国军事工程教育产生了奠基性的作用与影响，但是由于苏联教育制度的高度计划性和苏军过分等级森严的条令条例传统，因而在新中国军事工程教育发展的初期出现了一些由于机械化照搬带来的与新中国军事工程教育实

际情况不相适应的问题和弊端，甚至还与苏联专家发生了一些分歧和冲突。所有这些为国外经验民族化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教训。

军事工程学院建院之时，在全国全军“将苏联一切先进经验学习到手”的向苏联学习的热潮下，学院从组织编制与专业设置，再到教学与科学研究等各项工作几乎都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开展起来的。在建院过程中，有盲目照搬苏联做法的倾向，在实际教学工作中造成了一些问题。

当时，学院机关和系的各个部门与教研室几乎都聘有苏联顾问与专家，这就涉及一个向苏联专家“学什么”和“怎么学”的问题。对此，毛泽东的指示是：“在军事科学技术方面要全学人家的，咱们不懂，没有办过这样的学校，在学习过程中随着我军的发展实际不断提高，吸取精华为我所用，这就是‘洋为中用’的方针，不能说是教条主义；在军事行政管理与训练方面主要是学习人家的正规化建设与训练方面的经验，不要怕有点形式主义；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要发扬我军数十年来行之有效的思想领先、政治挂帅的传统，不搞一长制、命令主义。不学的地方也要讲究方式方法，不卑不亢，多做耐心解释工作，不能影响团结。”<sup>[3]699</sup>因此，在向苏联学习的过程中，军事工程学院奉行在教育教学方面以苏联专家为主的方针，比如，《教学过程组织基本条例》、教育教学计划等是由苏联专家一手制定的，几乎是完全照搬苏军院校的；但在政治与行政管理方面，则是在征求和尽量采纳苏联专家建议的基础上以我为主，坚持我军自己的特有传统，比如，组织编制上坚持两长制的设置、学员政治教育中坚持以重点讲授中国革命史和中共党史内容为主（苏联专家认为政治理论教育中应该首先和重点讲授苏共党史）等。尽管军事工程学院对如何向苏联学习一直持认真的态度，但由于在中国军事教育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此类办学经验，在很多时候很多地方只能听从苏联专家的建议，无法进行对比性甄别。因此，仍然出现过一些由于盲目学习所带来的问题，比如



教学中实行上课“六节一贯制”。“六节一贯制”是指从早晨八点开始上课, 上午连续上六节课, 直到中午两点才吃午餐, 下午是学员自习时间。按照苏联专家的介绍, 苏军院校都是实行“六节一贯制”, 其实这与苏联的实际情况有关。苏军院校的学员是早晨来到学校, 领了保密包去上课, 上完课以后交了保密包就回自己的住处, 学校不担负学员的食宿, 实行的是生活社会化, 因此为了学员和教员的方便实行上课时间六节一贯制。但是当时军事工程学院学员的衣食住宿和教员的住宿全由学校负担, 不存在学员下课后回自己住处的问題, 因此没有必要实行六节一贯制。然而, 当时的学院并不了解这些情况, 只能按照专家提出的建议实施六节一贯制, 结果让很多学员和教员到第五节课的时候已经是沒有精神了, 教学效果自然不好。直到 1957 年学院派出了以副院长刘居英为首的军队院校代表团去苏联军事院校参观访问以后才明白其中区别, 后来进行了相应的调整。

政治与行政管理方面虽然坚持以我为主, 但却因此和苏联专家产生过不少分歧, 尤其是关于一长制与两长制、副院长与教育长之争的问题始终无法达成共识。此外, 由于中苏两军具有不同的军事习惯和传统, 这也引发过一些分歧甚至冲突。比如, 苏军干部和战士之间以等级森严闻名, 而我军则是官兵一致、尊干爱兵的传统, 因此, 苏联专家对军事工程学院制定的排长和战士一起学习文化知识的规定不认同, 专家认为排长是指挥官, 不能和战士一起学习<sup>[22]</sup>。此外, 因军事传统不同还发生过“一件雨衣的故事”, 事件的起因是 1955 年 4 月的一天, 一位警卫战士在站岗时突然下起大雨了, 刚好一位干部经过, 见到战士没穿雨衣仍在站岗, 就把自己的雨衣给这位战士披上, 战士为此很受感动, 向学院的《工学报》写了题为“一件雨衣的故事”的短文, 以此来宣扬这位干部爱护士兵的优良行为。这对于我军来说, 确实可以是一件值得宣传的事情, 因为尊干爱兵是我军的优良传统, 对于军官干部而言, 要“以亲如兄

弟的感情爱护士兵”。但是, 首席顾问奥列霍夫看到这则短文后, 对此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这违反了警备卫兵勤务条令中卫兵在执勤时绝对禁止与除带班和接班卫兵之外的任何人谈话和接受任何人的东西的规定。因此, 送雨衣的指挥员的行为不仅不是一种可以被表扬的行为, 反而是一种错误的行为, 应该受到处分; 哨兵的行为则是一种军人犯罪行为, 更应该受到处分<sup>[23]</sup>。李懋之副院长将此事报告给陈赓院长之后, 陈赓认为, 顾问的意见是对的, 但我军尊干爱兵的传统也要保持和发扬, 因此不要批评这位干部。然而, 在顾问的坚持下, 《工学报》在两个多月后还是登出了一份涉事干部的检讨声明。由此事件可以看出, 中苏两军在军人条令和纪律方面存在着观念和传统的差异, 这种差异导致了一定程度的冲突。

1956 年, 全国开始了对学习苏联模式的反思, 1958 年全军开始了主要针对军队院校的反教条主义, 军事工程学院也组织教员和学员认真讨论和反思了学习苏联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在这次反教条主义中虽然出现过一些失误, 比如对一些人的错误批判, 但整体而言, 经过这次反教条主义之后, 军事工程学院基本克服了在某些方面照搬苏联模式的倾向, 更多地在吸收苏联专家建议的前提下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各项工作。这不仅表现在政治与行政管理工作方面, 同时在教育教学中也根据实际情况相应修改了一些由于机械化学习所带来的弊端和问题, 比如六节一贯制的作息时间等, 由此进一步确立了“以苏为鉴、以我为主”的办学方针。

尽管军事工程学院在学习苏联过程中存在过一些问題和弊端, 但是苏联专家和苏联援助在军事工程学院建院和发展初期所起的奠基性作用以及对新中国军事工程教育的影响则是不可磨灭的。

## 参考文献

-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 苏联军事百科全书: 军队建设[M]. 北京: 解放军出版社, 1986: 405.
- [2] 凯泽, 科尼希. 工程师史: 一种延续六千年的职业[M].

- 顾士渊, 译.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181.
- [3] 《陈赓传》编写组. 陈赓传[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3.
- [4] 当代中国丛书编委会. 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上)[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2: 6.
- [5] Т. Г. Зазерская. Советские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итая: 1949–1960 годы [M].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00.
- [6] 李懋之. 陈赓大将创建哈军工[G]//国防科技大学校史办. 校史资料汇编: 第六辑. 长沙: 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 1989: 6–7.
- [7] 赵阳辉. 1953–1966 年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 刘居英院长访谈录[J]. 中国科技史料, 2003(4): 322.
- [8] 苏联专家阿列列霍夫等关于筹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诸问题的谈话记录[G]. 国防科技大学档案馆, 1952-033-005.
- [9] 关于调整全国军事学校的命令[G]. 国防科技大学档案馆, 1952-004-001.
- [10] 滕叙究. 哈军工传: 上卷[M].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3: 63.
- [11] 总参谋部批准军事工程学院暂行组织编制表. 国防科技大学档案馆, 1953-003-001.
- [12] 首席顾问奥列霍夫对学院 23 个月工作的意见[G]. 国防科技大学档案馆, 1955-006-011.
- [13] 军事工程学院教学过程组织基本条例. 国防科技大学档案馆, 1953-012-005.
- [14] 国防科技大学校史编委会. 国防科技大学校史[M]. 长沙: 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 1993: 25.
- [15] 卡夫坦诺夫. 苏联高等学校的生产实习[M]//教育资料丛刊社. 苏联的高等教育.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51: 108.
- [16] 关于学院科学教育工作几个问题的发言[G]. 国防科技大学档案馆, 1956-005-008.
- [17] 国防部检查组对军事工程学院的检查工作总结报告[G]. 国防科技大学档案馆, 1955-004-009.
- [18] 首席顾问奥列霍夫谈学院中的科学研究工作[G]. 国防科技大学档案馆, 1954-004-004.
- [19] 学院 1957 年第二届科学技术研究会议文件汇集[G]. 国防科技大学档案馆, 1957-016-004.
- [20] 此数据依据国防科技大学档案馆的 1954-004-011 各系教授会已来专家名单、1955-005-004 军事工程学院各系现有专家名单、1957-008-004 1957 年学院苏联顾问及工作人员名单、1958-033-006 1958 年 6 月拟返回的苏联专家名单、1958-033-012 呈报关于聘请苏联专家问题、1959-003-001 国防部办公厅通知我院 1959 年增聘的苏联专家名单、1959-015-001 1959 年专家工作总结报告七卷档案提供的数据综合判断和推算得出.
- [21] 张文峰. 关于军事工程学院教学与科研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回忆[G]//国防科技大学. 国防科技大学回忆史料. 长沙: 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 1990: 73.
- [22] 首席顾问奥列霍夫检查队列部工作的综合材料[G]. 国防科技大学档案馆, 1954-004-005.
- [23] 学院首席顾问奥列霍夫同志对工学报刊登“一件雨衣的故事”的短评的批评[G]. 国防科技大学档案馆, 1955-006-012.

## Soviet Aids and the Beginning of New China's Military Engineering Education: Taking Harbin Institute of Military Engineering as an Example

Yang Aihua<sup>1,2</sup>, Hu Xinhe<sup>1</sup>

(1. School of Humanities, Graduate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89;

2.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Defense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74)

**Abstract:**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historical function of Soviet aids at 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military engineering education by taking Harbin Institute of Military Engineering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probes into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Soviet aids to Harbin Institute of Military Engineering from the aspects of institute establishment, site selection, organization and teaching research. The paper also analyzes the impact of Soviet aids on Chinese military engineering education and discusses the lessons which Harbin Institute of Military Engineering could learn from Soviet Union.

**Key words:** Soviet Aids; China; Military Engineering Education

□责任编辑：王佩琼